

象征交换与文化的生死轮回

——从“侨易”到“涵濡”

胡继华

毫无疑问，“侨易”概念的提出，乃是对世界体系全球时代的跨文化实践中的难题的回应。“侨”为迁转、飞散，而“易”为生成、质变，杜撰出“侨易”这么一个学术陌生化的概念，是为了以“长时段眼光”来观看历史，以“文化深呼吸”来体证人种、技术、金融、形象媒介以及意识形态五大景观的交融、变乱和有序和谐。“侨易学的出现，乃是为了更好地给我们观察变动不居的大千世界、纷繁复杂的人事兴替红尘滚滚的功利时代，提供一种理论与学理上的支持，同时开辟出一块新的更高的学术平台”。¹这份学术志业无疑也可以看做是一份文化共业。因为，从公元前 5000 年前物品

¹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22 页。

体系与声望符号交换，到资本主义全球拓展时代的价值交换，到媒介文化时代的拟象交换，说到底都是象征的交换传递着生命的盈虚消息，以及文化的生死轮回。

“侨易”重变迁变异，形象与精神呈散播状态，而凸显了空间维度。然而，跨文化实践及其理论思考却应该更重“涵化”与“生成”，形象与精神呈涵濡状态，而凸显时间的维度。所以，笔者借用王一川教授的“文化涵濡”概念来描述“知识侨易”的未来景观。²

一、文化涵濡与中国历史意识的启蒙

文化涵濡，是指远缘近缘的多种文化之间深层的涵化与濡染从而导致文化精神内在隐性变异的过程。“涵濡雨露，振荡风气”（苏轼《墨竹赋》），歌咏的是外在宇宙的自然

² 参见王一川：《层累涵濡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发生于演变》，载于《文艺争鸣》，2013年，七月号，第228期。

世界涵化濡染而活力弥漫新风荡漾的景观。中学西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王国维《国学丛刊序》），描绘的是普世之间学术文化实践涵化濡染而互相推助诸分进化的态势。“山河大地，皆吾遍现，翠竹黄花，皆我英华”（康有为《中庸注》），憧憬的是天人合一六合同风的世界文化乌托邦境界。

从历史长时段来看，公元前 20 个世纪，欧亚非三大板块的文化就以地中海为中心发生了一场史前文化涵濡，世界历史的黎明就在这里破晓，文化宛如百川归海，汇聚于古希腊世界的丽日蓝天之下。在对抗、冲突以及涵化、濡染的变奏中，史前时代的全球化运动不仅成就了希腊-罗马文化艺术的辉煌，而且铸造了欧洲文化传统的坚实根基。史前地中海的考古学图画中，一个“大统一的世纪”和“国际性文化”朗然显现。布罗代尔断言，经受这次文化涵濡，近东地区有了明显的跃进，一方面是超越，另一方面是统一

得到巩固。克里特文明，作为文化涵濡的范本形象，早就赫赫生辉，成为哲人柏拉图的美好城邦原型之一。³20 世纪后半叶，欧洲中心主义落潮，文化霸权主义浸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去势，人类学藉着史前考古学图像重描和深描世界文化图景，将涵濡提升为审视全球跨文化交往和人类独特文化创制的一个基本视角，当然也是回观百年中国现代诗学创制及其成就的一个基本视角。弗里德曼指出，早在 5000 年前的泰古，文化涵濡就已经造就了一个世界体系或全球秩序。这一全球通史以“声望物品体系”为中心开启了商业文明和殖民世界。考古学记录既是“涵濡”（acculturation）的见证，又是“殖民”（colonialization）的写照。涵濡并不只是一个符码学习的简单过程，而是文化认同改变的基本程序。换言之，涵濡对于理解社会情境、文化变迁和生存品格具有最为本质的意义。“西方霸权当前

³ 参阅布罗代尔：《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世界史》，蒋明炜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第 93-94 页。

的衰落和世界体系去中心化的突出特征是文化运动，即那些明显颠覆了似乎在世界范围上日益增强的文化同质化的新认同和民族认同的运动正在相伴而生。”⁴“文化同质化”

(homogenization of cultures) 表明世界体系的一体化走向，而“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则标志着文化精神的多元化趋势。文化涵濡则是对这同一进程之两个方面的概括，既体现了人类整体的因袭性，又凸显了民族文化的原创性。

中国之进入世界体系而展开全球性文化涵濡，要追溯至梁启超先生所说的“近世史”。1901年，任公撰写《中国史叙论》，书中详述“中国”观念的内涵及其演变，以此观念为核心，提出“三个中国”说：“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⁵任公这一说法

⁴ 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进程》，郭建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9页。

⁵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据吴松等《饮冰室文集点校》，第3册，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6-1627页。

扎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巨大“创局”，而将华夏民族历史置于“世界体系”的变迁情境中，尤其表现出对华夏与泰西“交涉竞争”的忧虑。任公将“世界之中国”溯至乾隆末年，时间上也许太近了些，同时以国家政制嬗代兴起作为近代史的根本命脉，内涵上也许太狭隘了些。也许，“世界之中国”可以上溯到明朝万历 28 年（1600 年）。在这一年，徐光启遇见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涵濡进入实质性阶段，古典儒学传统与泰西基督教传统开始“交涉竞争”，文化现代性的黎明正在破晓。明朝嘉靖 35 年，上海多处破土动工，造园运动如火如荼，边海城市呼之欲出，而海关开放只需时日。泰西商人携来的异域文化，历朝圣贤流亡或朝廷偏安传播的中原文化，播散乡野弄堂而水深土厚的民间文化，以及涌动在海边传播于运河的新生商业文化……远缘或是近缘的多元文化，在此异体化生，互相涵化，彼此濡染，往复滞留，衍生不息，文化精神的深层发

生了隐性的变异，文化实践的表层空间也发生了规模广大的变迁，预示着一一种现代性精神气质的变化。

故此，文化涵濡乃是“知识侨易”所瞩望和承诺的未来景观，以象征交换呈现人类的共业，以及文化的生死轮回。梁启超将知识侨易、历史意识与文化涵濡直接同中国现代启蒙意识关联起来：“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⁶

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二、文化涵濡到世界文学经典的生成

从“知识侨易”到“文化涵濡”，跨文化实践呈现了世界体系的形成，世界体系之中经典符号的世界化，以及比较文学向“世界文学”的转型。

丹洛诗（David Damrosch）在世界体系的全球化时代以经典的“侨易”为中介呈现了文化涵濡的逻辑，重建了“世界文学”概念。在他看来，一部作品是否是世界文学，取决于两个事实：第一，取决于它的翻译、流通和普遍阅读的状况；第二，取决于人们超越源文化语境展开阅读的程度。一部作品超越民族文化语境而进入世界文化流通秩序，同语言、时代、经济、政治、宗教等诸多要素纠缠在一起，作品在流通之中发生变化。

通过回顾二战之后比较文学的论争，运用世界体系分

析方法研究当今世界文学格局，选取古今文学翻译个案予以分析，丹洛诗阐释了“世界文学”概念的内涵。归纳起来，他的基本论点是：（1）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椭圆式折射；（2）世界文学是通过翻译而广泛流通的所有作品；（3）世界文学不是一套固定的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即超越地接触自体时空之外的世界。在这个理解框架下，有三个理论问题值得予以特别强调——椭圆式折射，世界体系分析方法，翻译对于世界文学生成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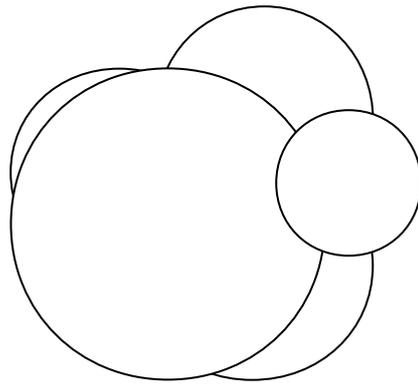
第一，“椭圆式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所有文学作品无不诞生于一个民族文学传统之中，因而必须从现代“民族”概念入手理解世界文学。现代民族是一个相当晚出的范畴，甚至更古老的文学作品也出现在地方种族的格局之中，而客观地归属某些民族传统，在这些传统之中得以保存和流传。在广义上理解“民族”概念，它就不只是一个种族概念，而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因而，我们可以说，就算是

进入了世界文学流通秩序，那些作品也仍然打上了源生民族的印记，而当一部一部作品远播他乡，这些印记也广泛扩散，更加轮廓分明地形成折射效应。不仅如此，这种折射效应在本质上却是双重的。作品被接纳到一种外在文化空间，它就成为世界文学；而这个文化空间乃是由主方文化的民族传统及其作家的现时需要以多种方式规定的。甚至一部世界文学作品也会成为两种不同的文化协商的场所接受方的文化（主方文化, receiving culture）可能以一切方式利用外来素材：或者在肯定的意义上视之为自体传统未来发展的模式，或者在否定的意义上视之为源始的颓废的残余痕迹，而坚决地予以回避或者连根拔起，或者在不偏不倚的意义上视之为一种激进他者的形象，并借以更加清晰地定位自体文化传统。世界文学永远涉及到主方文化的价值和需要，以及一部作品的源生文化。因此，世界文学是一种双重折射。我们不妨通过椭圆形象对这个折射过程

予以描述：原生文化（source culture）和主方文化(host culture)提供了两个圆心，因而产生了一个椭圆空间，供一部作品作为世界文学而存活，而这部作品联系着两种文化。其中任何一种文化都无法单独规定世界文学的流通空间。

椭圆式折射是一个复杂的二重塑造过程，这就意味着世界文学的流通远远不只是韦勒克所谴责的“文学外贸”，也不至于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普世主义。那种高高在上的普世主义将文化差异视之为“异数”，力求剪尽灭绝而后快。然而，如果我们心照不宣地承认，在世界文学的生命之中民族性依然持久存在，那么世界文学研究就遭遇到了巨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必须超越一个、两个时期，超越一个、两个民族传统而放大研究的焦点，那么，比较研究如何进行？“要想充分理解世界文学的椭圆流通过程，只要考虑单一文本或一组文本就可以了；但是，当我们开始放眼远观，马上就会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部分叠合的众多椭圆之中，它们共

享着主方文化圆心，而其第二个圆心则更加广泛地分布在不同的时空之中。”



第二，世界体系、多元系统与世界文学。如果“世界文学”基本上局限于欧洲主要超级大国的文学，那么，不论理论上如何清楚明白，它在实践上都难以公正地对待源生文化。比较文学越来越倾向于尝试采用一种真正的全球视角“世界文学”研究计划变得捉襟见肘。面对当今视野之内目不暇接的文本与文化，比较研究者可能致力于将他们的研究

对象置放在广阔的模式和运动之中，而这势必减少甚至清除对个别文化特别是个别文学作品进行切近研究的需要。

莫莱蒂一反“新批评”的精读研究法（close reading），而提出全球视野下的远读研究法（distant reading）。“近观其质，远观其势”，精读研究法适合于用来把握个别的作品，而远读研究法则可以把握全球时代文化与文本的复杂流通。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研究全球社会政治研究中提出了“世界体系”（world system）概念，用以描述“世界变成一个整体”的不平等运动。“在世界体系分析中，坐标发生变化，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就将许多物种或者语言起源所需要的独立空间仅仅减少到三个位置：中心、边缘和半边缘。世界变成一个整体，不平等的整体：说它是整体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遍及世界所有角落；而不平等，是因为其交换网络要求并加强三个区域之间显著的不平等。”⁷运

⁷ 莫莱蒂：《进化、世界体系、世界文学》，见陈永国等主编：《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244页。

用世界体系分析方法，意大利学者莫莱蒂描述了1800年至1900年整整一百年的欧洲小说生成扩散的地缘谱系。莫莱蒂得出了与以色列翻译理论家左哈（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体系论”（polysystem）一致的结论，说世界文学本质上是文学作品在世界体系中流通和扩散而产生的多元体系。形象地说，世界文学既是一个家族之谱系树上衍生的后裔——一个民族文化系统树干上旁逸斜出的枝条，又是前浪奔腾后浪汹涌而席卷整个世界的流通与转换。反对将文学作为一个静态的单值符号系统，左哈将文学视为一个异质的开放的结构，其中多元系统互相交叉彼此重叠，同一时期有不同的要素可供选择，而又互相依存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发生作用。⁸将“世界体系”与“多元系统”结合起来，运用“树”和“波”两个隐喻形象，丹洛诗将世界文学描述为同质化和异质化并行的流通转换，要求比较研究者在方法论上将

⁸ 廖七一：《多元系统》，参见赵一凡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53-60页。

远观与近观统一起来，见木也见林。以印度和巴西的语言和文学为例，丹洛诗雄辩地证明：“对于任何特定的研究者而言，甚至一种地地道道的全球视野也仍然是来自某个地方的视角，世界文学流通的全球模式也是在地域呈现之中现身成型。”

第三，翻译在世界文学经典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波斯经典《鲁拜集》、日本经典《源氏物语》和中国唐代经典诗歌的英语翻译为例，丹洛诗强调世界文学就是在翻译过程中所得到的全部作品。翻译具有时代性与地域性，而且同翻译者的文化背景、个人气质有复杂的关系，因而世界文学经典具有不稳定性，同时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丹洛诗在论文最后部分选取北岛诗歌翻译所引起的争论为个案阐述世界文学观念，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尤其具有启发意义。1988年，中国著名诗人北岛的诗集《八月梦游者》英译本出版，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撰写《何谓世界诗

歌？》，把北岛的文学创作说成是中国诗人向欧美现代主义投降，把他的诗歌说成是现代主义的平庸版本。这种充满了欧洲中心论霸气的论点，引来了华裔理论家周蕾的反击：“宇文所安蔑视北岛的新世界诗歌的基础，乃是一种失落感，因而也是对其思想立场的焦虑感……这种焦虑在于汉学家宇文所安业已着手理解的过去中国已经烟消云散，汉学家自己难免成为废物……。宇文所安在自己文章的结尾酸溜溜地说，‘晚期二十世纪欢迎你’，他的真心怨尤在于，他本人就是这么一个八卦世界的牺牲品，面对这么一个怪异的秩序，像他这样愠怒而且无能，是惟一的真理诉求。”宇文所安的论点未免有些东方主义者的伤感，伤感的背后却是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论。周蕾的反击未免有几分民族主义者的尖刻，在尖刻的极致却自然流露出第三世界的反弹式的斗志。对照几个北岛诗歌的英译本，丹洛诗陈述了一种“比较的世界主义”立场：不同于无根的世界主义，诗人

北岛在双重甚至多重意义上关联着本土中国和异域世界的历史事件、广大读者。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翻译，因而英语中的北岛不是汉语中的北岛，但毕竟有某种独特的中国风味蕴含在北岛的世界诗歌中。“一切作品，只要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它们就不复是其源生文化的独特产物；一切都是惟独‘发源’于源生语言之中的作品。”远远不只是游离于一切民族语境之外，北岛的作品事实上招致了美国与中国文化之间新一轮的复杂协商，招致了一场横跨太平洋纵贯20世纪的往返运动。

在世界文学语境之中阅读北岛的诗歌，正如阅读《源氏物语》的译本一样，人们绝对不可能完全沉浸于各自的文化中，而这恰恰就是在民族语境下阅读一部作品的目标这就构成了一个悖论问题：如何摆正同质性与异质性的关系？为解决这个问题，丹洛诗提出了一种世界文学研究的方法：

阅读和研究世界文学本质上必须确立一种超然介入 (detached engagement) 的姿态，藉此而进入一场不同的与作品的对话，这场对话不会导致认同或者征服，而是要确立距离和差别的规则。正如罗宾斯所说，有一种随着地域而变异的世界主义，这种研究姿态不会导致一种完全超然的境界 (an ideal detachment)，而是导致“一种再度连结、多重连结和远距连结的现实”。我们同作品相遭遇之所，不在其源生文化的核心，而是在源自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的作品之间生成的力量之椭圆区域。这种椭圆型关系已经刻画了我们的异域民族传统体验的特征，然而也可能有一种意味深长的程度差异，因为椭圆在不断增加，反射角度也在增大。组合与关联流动不居，其可能性又多种多样，如此限定了一个具有意义负荷的场域 (charged field)，世界文学作品在这里面彼此互动。当下的处境，周遭和从前

千差万别的他者文化，我们在三分格局之内往返流连，却看不到世界文学作品那么完美地秘藏在其文化语境中，就像我们在其各自传统中阅读这些作品时所看到的那样，然而作品远离自体传统的程度可能有助于我们把握一部文学作品以何等方式伸展，如何离开其源生状态。如果随后自察之时又看着作品抽离其源生状态，我们就可能得尽天时地利，居高而远眺。当我们遭遇一个来自远方的文本，结果可能完全同施莱尔马赫构想的“视野融合”相反。我们可能实实在在地体验到，在一望便知的异域性作品的影响下，习以为常的视野无声地倾斜了。⁹

这一段论述相当晦涩，其关键词语是“超然介入”。何谓“超然介入”？在此显然是指从事世界文学研究的人，面对复杂流变的文本和文化流通过程必须保持能入/能出的自由。

⁹ David Damrosch, “World Literature, National Contexts”, printed in *Modern Philology* 100:4 (2003), 512-531.

主动参与文本和文化的互动，是谓“介入”；同复杂的文本和文化波流保持一种适度的距离，是谓“超然”。比较研究者之于世界文学，犹如诗人之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王国维《人间词话》）。入乎其内，则能体验到文本与文化之异质性传统；出乎其外，则能领略文本与文化的世界化趋向。惟有在能入能出之际，在若即若离之间，比较研究者才能把握住“世界文学”与“民族语境”之间的辩证关系。